



# 爱国将领吉鸿昌“作官不为发财”

吉鸿昌(1895—1934)河南扶沟人,字世五。1913年加入冯玉祥部,曾任宁夏省政府主席。1930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三十军军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筹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北路前敌总指挥。1934年11月24日,在北平炮局监狱牺牲,时年39岁。

1913年的秋天,不满18岁的吉鸿昌从河南扶沟吕潭镇前往堰城投军。打起仗来,他经常袒胸露背、赤膊冲杀,人称“吉大胆”。冯玉祥对他很赏识,送他到模范连当学兵,之后提升他当手枪连连长。

## 作官不发财 烧制茶碗牢记父亲遗训



吉鸿昌。

1920年5月,老父亲吉茂松(字筠亭)患病,25岁的吉鸿昌回家探望。老父亲依依不舍地嘱

## 倾囊办乡学 使国家强盛不受侵略

吉鸿昌只读过两年私塾,从军后亲身体会到没有文化的苦恼。1922年,部队移防河南,在文书郝子固的陪同下,吉鸿昌回家探亲。他对郝子固说:“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光靠咱们这些当兵的打仗不够,要让穷子弟上学读书,我准备在家乡办学。”

吉鸿昌把多年积攒下的100多块银元全部拿出来,利用城隍庙作校舍,创办“吕北初级小学”,还说服郝子固留下来,当校长兼老师。吉鸿昌交代:凡贫穷儿童入校一律免费,书籍文具由学校供给;特别困难者给予衣物、鞋袜等生活补助。

吉鸿昌买来织袜子、织毛巾的机器,组织学生半工半读,解决他们吃饭、买书的问题。当师长的时候,他又买来一辆快报废的

嘱咐他:“我有一句话要向你说明,当官要清白廉政,多为天下穷人着想,作官即不许发财。”吉鸿昌含着泪答道:“孩儿记住了,请父亲放心!”

老父亲病逝后,吉鸿昌把老父亲“作官即不许发财”的嘱咐书写在细瓷茶碗上,右题“先严筠亭公逝世纪念”,左记“摘自先严遗囑 吉鸿昌谨遵”,交给陶瓷厂仿照烧制。瓷碗烧好后,用车拉到部队,集合全体官兵,举行严肃的发碗仪式并立下誓言:“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我绝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家父的教诲,作官不为发财,要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

吉鸿昌把“作官即不许发财”的细瓷茶碗一直带在身边,直到英勇就义。

汽车,供学生学习机械原理,学开车、修车。这些办法吸引不少贫困子弟前来求学。

1929年,吉鸿昌当宁夏省主席后,在吕潭镇西北隅置地50亩兴建新校舍,校名改为河南省私立吕潭中学校,学生1600多人,规模超过扶沟县立中学,号称“豫东第一”。

吉鸿昌每次回家乡,都与学生们一样食宿在校,查看学生寝室、食堂,了解教学情况。有一次他给学生讲话:“我办学有两种想法:一是培养人才,使国家强盛,不受帝国主义侵略;二是古往今来武将很少有下场,一旦跌倒,难免家灭门,财产充公。与其难见人充公,何如早些我自己充公,给国家、给老百姓办点有益的事情?”



吉鸿昌使用过的瓷碗。上面烧制着吉鸿昌父亲的遗训:“作官即不许发财”。

## 求真明大义 财产生命献给党和人民

吉鸿昌的侄儿吉星兰仗着吉鸿昌的名望,横行乡里。1926年,他与卖凉粉的赵兴运之妻勾搭成奸,为达到长期霸占的目的,两人用毒药将赵兴运毒死。时任西北军十九师师长的吉鸿昌听说此事,勃然大怒,亲手枪毙了侄儿吉星兰和赵妻。乡里百姓大为赞叹。

1932年4月,吉鸿昌由中共北方政治保卫局(即北方特科)吴成方介绍,成为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

从此,他不仅恪守父亲“作官即不许发财”的朴素家训,更把自己的财产和生命都献给了党和人民。

1933年,为筹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让妻子胡红霞将家里的全部财产变卖了6万多银元,购买武器弹药。抗日同盟军失败,他脱险逃到天津后,又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继续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 我何惜此头“为抗日而死死也不倒”

1934年11月8日,吉鸿昌在天津国民饭店(今天津和平区花园路4号)145号房间开会时,被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拘押,后被秘密押往北平炮局监狱。国民党特务拿出一份名单,让吉鸿昌指认哪些是共产党员,吉鸿昌昂起头,“共产党员就我一个人,要杀要剐都是我!”蒋介石得知吉鸿昌“冥顽不化”后,密电“就地枪决”。

1934年11月24日,天上飘起了雪花,吉鸿昌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捡起一根树枝,在雪地写下荡气回肠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

如此,我何惜此头?”

写罢,吉鸿昌对特务们说:“我为抗日而死,光明正大,不能跪下从背后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遂喝令特务:“给我把椅子搬来!”椅子搬来了,吉鸿昌面对敌人的枪口坐下,厉声喝道:“我要亲眼看到反动派怎样枪杀爱国者!”

枪声响了,吉鸿昌一下仰倒在座椅上。39岁的生命之花,融入漫天雪花之中。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吉鸿昌被定为全党褒扬的革命烈士。(据《新京报》《北京晚报》)

#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干部考核工作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干部考核工作,有明确的制度、规范的程序、灵活的方式、严格的标准、完善的奖惩措施。在这些“合力”的作用下,干部考核工作卓有成效。广大干部积极向上,争当先进蔚然成风,既造就了优秀的干部队伍,也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广大干部投身抗战和伟大革命事业的积极性。

## 明确的考核制度

延安时期,为使考核和监督干部有所依据,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制定颁布了相关法律法规,形成了明确细致的规章制度。1941年7月2日,陕甘宁边区制定施行《边区公务员考核奖惩暂行条例》,明确了考核时限、考核标准及等级等。《陕甘宁边区政府办事通则》也规定:“本府工作人员每年进行一次考核,考核一般在年终进行,如有重大工作任务则在工作完毕总结时同步进行。”当时,对公务员任职多长时间可以参加考核也有明确规定,“不得擅离职守”“不得发表与边区政府政策法令相抵触的文字或谈话”等。

为确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任务的完成,发扬干部的积极性和模范作用,鼓励进步反对落后,边区政府1943年4月25日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1943年5月8日,边区政府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公务人员公约》,短短10条123字的公约,明确了各级公务人员的行为准则。特别是在第五条加注时,对品格方面的要求专门作了说明。这些规定,要求所有公务人员必须自觉遵守,使其落到实处。

这些条例制度是对政府公职人员进行考核的重要依据,对监督考核各级公务人员具有极强的制度规范性。此外,1941年5月21日制定的

《工作报告大纲》,1943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政务人员交代条例》等,也对当时干部考核和监督有重要的制度参考价值。

## 规范的考核程序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干部考核与奖惩,归口由边区民政府负责,分级进行。1943年4月25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条例草案》指出:边区各级政府所派之干部,其登记审查、考核奖惩等均由民政府统一管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草案》也规定,由哪一级任用的干部由该级主管领导和干部管理部门负责考核。

对干部考核时,首先要组成考核委员会。关于考核委员会组成,《边区公务员考核奖惩暂行条例》规定:“边区公务员每年考核时,由各主管机关长官及高级职员3人以上,组织考核委员会,以1人为主席;边区、分区、县之考核委员会组织后,呈请边区政府委员会批准行之;各机关之考核委员会,经其主管上级机关批准行之。不得有任何阻挠,亦不得置之不理。”

为慎重地开展考核与奖惩工作,平时边区各分区县市必须设有一名专人负责管理干部,并要忠实可靠,政治上经过考验,而且必须经过各级负责同志提出,民政府批准者方可胜任。考核时,组织各级考核委员会负责考核。每次考核结束,须填写并出具由边区政府制定的规格统一的考核书。考核书是干部升级调动时必须具备的文件,在调动时如不携带,所去的工作单位或机关可以拒绝分配。除此之外,陕甘宁边区还通过定期鉴定进

## 完善的考核标准和奖惩措施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已经把干部忠实党的纲领政策、干部个人德才智、干部的群众意识、干部的工作态度及奉献精神作为考核标准,颇具先进性。如陕甘宁边区政府明确了各级干部任用合格的四条标准:关于考核标准及等级,《边区公务员考核奖惩暂行条例》规定:“工作50分,学习25分,操行25分。”为了掌握分寸,边区政府专门作出补充:关于工作、学习、操行标准,例如工作以研究进步,著有论文为一等;研究进步富有创造为二等;学习按照最高参考材料作成笔记为一等;按照普通参考材料作成笔记为二等;操行以思想、意识、行动为标准。该条例还将考核等级按分数多少定为七等:“90分以上者为一等,升级;80分以上者为二等,晋级;70分以上者为三等,记功;60分以上者为四等,不予奖惩;50分以上者为五等,记过;40分以上者为六等,降级;30分以上者为七等,解职。”

在奖惩方面,对通过考核且在边区各项具体工作方面成绩优异或起到模范表率作用者,以提升、记功等办法进行奖励。而对不作为、不担当、腐化堕落的干部则进行有力惩戒。同时规定:“因工作关系不能升级降级须用其他奖惩者,由各考核委员会通知该主管机关办理之。”

## 显著的考核成效

在一系列有效的考核机制下,陕甘宁边区的公务人员可谓德才兼备,

堪称模范。他们“在行政工作上,不辞艰苦,不避牺牲,在人格修养上,不贪污,不腐化,不虚伪,不拘格,不敲詐,不受賄,不賭博,不腐化,不墮落。三是考核时特别强调要把工作和学习中的研究和创造精神列入考核,深刻说明了延安时期对于党员干部在工作上是否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高度重视。四是考核时特别强调以巡视所得的材料作为考核下级工作成绩的参考,真正发挥了巡视工作的震慑作用。这些方面至今仍然有借鉴作用。(据《学习时报》)

# 志愿军老兵陈长发: “服从命令听指挥是军人的职责”

陈长发,1929年生,浙江兰溪人,1953年随部队入朝。在朝鲜期间,陈长发先是跟随部队打坑道,维护公路畅通。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陈长发负责三八线一带规定区域内的武装巡逻。陈长发荣立三等功。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主席发表讲话:“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

这一年的6月13日,陈长发随所在部队赴朝参战,负责在黑桥里打坑道、维护公路畅通。

当时,为了把以美国为首的侵略者打得老老实实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进行夏季反击战役。

7月21日晚上,大雨如注,一块巨石从黑桥里附近的山上滚下来,堵在了松林到祥源的公路中央,堵塞了100多辆军车。

前方急需炮弹等物资,伤病员也要后运,这条公路绝不能断!

排长陈长发召集全排党员开“诸葛亮会”,提出疏通公路的办法——打炮眼,炸碎石。

“朝鲜的石头都是‘金刚岩’,一锤子打下去,只能在石头上留下一个白点。”为了尽快打出炮眼,战士们争着抢着抡锤子,从开始每打50锤换一次人,逐渐到每打80锤换一次人,后来打百锤以上才肯把锤子交给别人。

轰隆一声巨响,近20吨重的巨石被炸成碎块,官兵一齐冲上去,用绳子拉、用肩膀扛……凌晨5时,公路运输恢复正常。

“服从命令听指挥是军人的职责。”陈长发带领全排出色完成任务,荣立集体三等功,他自己也被记三等功一次。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陈长发被抽调到三八线上的武装巡逻队,担任巡逻任务,维持停战秩序。

三八线地形复杂,有些地段没有明显标记。陈长发巡逻的地段,地处山沟内,敌我双方的阵地相对,对面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敌方常常采取一系列挑衅行动——

有人故意跑到三八线10多步,然后再跑回去,引诱我方开枪,拣走子弹头,给我方栽赃。陈长发和战友就在对方经常越线的地方,利用夜色掩护挖陷阱,捉俘虏,取证据……

有人把脚抬得高高的,炫耀他们的大皮靴。陈长发和战友就用石头砸被击毁在前沿阵地的坦克,宣扬中朝人民进行的是正义战争。

针锋相对的斗争,沉重打击了对方的嚣张气焰。

战争结束后,陈长发工作岗位数次调整。“他从来不和我们的部队上的事情,每次都是一个命令下来就走走了。”陈长发的老伴说。

1982年,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武装部副政委岗位离休后,陈长发积极投身国防教育,为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50多场,听众达五六万人次。

“明明知道敌人的大炮就在前面,我们也要去,毫不犹豫地去,这就是军人。”忘记了枪林弹雨的险境,忘记了艰苦卓绝的奋战,这句话却一直深深刻在老兵陈长发的内心。(据《新华网》)

# 银川地区7次大规模移民开发

历史上,银川地区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大体有7次(其中古代6次,近代1次)。

第一次,始于秦汉时期。蒙恬收复“河南地”,沿河置县,移民实边。汉武帝时多次移民到“新秦中”,大规模“募民徙塞下屯耕,兴修水利”,宁夏平原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农业灌区,黄河两岸新垦区成了新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了“冠盖相望”的繁荣景象。“新秦中”与“秦中(即关中)”相提并论,是当时最富庶的代名词。秦汉移民和农业开发,拉开了今银川农业开发的序幕。

第二次,是南北朝时期。北魏政权在历史进程中,深受农耕文化影响,不断从内地和关东移民到宁夏,恢复并促进这一地区的农业开发。北魏薄骨律镇镇将刁雍坐镇灵州的11年间,浚渠灌溉,恢复农业经济,灵州全境“官课常充”,粮食自给有余,还外运以供军需,而且开创了黄河上游的水运先河。北魏太和元年(477年)平“三齐”,又将历下(今山东济南)居民迁至秦汉浑怀障故地,设历城郡(即今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居屯。为这批移民专设一郡,说明移民人数不下万户。北周继续向宁夏移民,于建德三年(574年)迁2万户在大夏国改建的丽子园及其四周,置怀远县和怀远郡,扩大开发范围。此时,因南朝陈国的灭亡,有大批南人来到塞上,他们将先进的文化、风俗和先进的生产工具与生产经验带到塞上黄河岸边,使这片土地经济发展,民风大变,人人彬彬有礼,与移民老家江南水乡一样富庶和文明,始留下“塞北江南”的美名。

第三次,是唐朝时期。盛唐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的归附,为经济开发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引黄灌区水利的兴修,又为经济开发创造了条件。唐朝的宁夏河东、河西,已是良田阡陌,渠道如网,果树成荫,诗人韦蟾的诗句“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就描述了宁夏平原的繁荣景象。

第四次,是元朝时期。元代在宁夏建行省初,郭守敬来到宁夏,对黄河灌区的水利进行了大规模治理。元朝政权始设行省和惠民局,诏令流亡难民回原籍居住生产,后又陆续设立宁夏营田司、宁夏等处新附军万户府等屯田机构,“自六盘山至黄河立屯田,置军万人”,屯田数达4000顷。可见,当时的宁夏黄河灌区已是粮食丰产区了,还不断向东胜(今内蒙古鄂尔多斯)输送粮食,从而开

通了宁夏至东胜的漕运。元代的宁夏有天下“粮仓”之称。

第五次,是明朝时期。洪武九年(1376年),明朝开始陆续征调内地军民移居屯守,采取军屯戍边为主和民屯辅助的军政合一方式,对宁夏地区实行特殊的行政管理。这是宁夏历史上继秦汉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开发行动,入住宁夏的新移民有“齐、晋、燕、赵、周、楚之民,而吴、越居多,故彬彬然有江左之风”。当时,宁夏的军屯建设成绩斐然,宁夏全境各类军士总数最高时达7万,所有卫所军人皆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守城”。永乐初,卫所军为20413名,以14184名屯垦,计耕田8337顷,创造了“一方之赋尽出于屯”和“天下屯田积谷宁夏最多”的成绩,宁夏总兵官何福因此被朝廷“降敕奖谕”。随着水利的兴修,水政管理的加强,至万历前期,屯田数已发展到18828顷。

第六次,是清朝时期。雍正朝至康乾盛世时期,宁夏引黄灌溉网最终形成,并扩大了上百万亩的新灌区,使宁夏平原灌区农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其间因人口增加,宁夏基本结束了对外地移民的安置,多由宁夏南部向北进行区域性、局部性安置。雍正四年(1726年),兵部侍郎通智来到宁夏,主持新开垦的丽子园及其四周,置怀远县和怀远郡,扩大开发范围。此时,因南朝陈国的灭亡,有大批南人来到塞上,他们将先进的文化、风俗和先进的生产工具与生产经验带到塞上黄河岸边,使这片土地经济发展,民风大变,人人彬彬有礼,与移民老家江南水乡一样富庶和文明,始留下“塞北江南”的美名。

第七次,是马鸿逵主政时期。近代宁夏,多灾多难,人口急剧下降。1933年,马鸿逵任宁夏省主席后,设立垦务局,积极谋划垦务,发布“招垦荒地,奖励生产,复兴农村”的布告,吸引大批的外省移民进入宁夏。最为显著的是1939年,国民政府从甘肃天水迁移2万移民进入宁夏从事垦殖,这些人后来大多停留在宁夏北部。

就农业开发而言,因各种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宁夏经济开发比较缓慢,几乎是相隔数十年上升一个台阶。但农业开发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自秦汉以来,无论是汉族封建地主还是少数民族贵族建立的政权,其在宁夏主要职能的发挥,就是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屯垦和兴修水利。因此,移民、修渠以及为军事斗争和经济开发服务的交通建设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和政权经营宁夏的三项特殊政策,而且代代传承。移民形成了银川平原“五方杂处”“风俗不纯”的独特地域文化,即称之为塞北江南的黄河文化,或曰移民文化。(据《历史银川》)